

丝路盛开友谊花

编委会主任 铁木尔·达瓦买提

编委会副主任 王运泽 冯佐库

主编 时延春

世界
出版
社



丝路盛开友谊花

编委会主任 铁木尔·达瓦买提
编委会副主任 王运泽 冯佐库
主 编 时延春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盛开友谊花/时延春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2

ISBN 978 - 7 - 5012 - 3284 - 0

I. 丝… II. 时…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阿拉伯
国家 IV. D82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2561 号

书 名: 丝路盛开友谊花

Silu Shengkai Youyihua

责任编辑	方 琳
封面设计	娟 子
责任出版	林 琦 刘 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960 毫米 1/16 23½ 印张 8 插页
字 数	3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284 - 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中华大地与阿拉伯世界是两块神奇的大地。中华民族与阿拉伯民族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友好交往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昔日，那些令人敬佩的开拓者们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以大无畏的精神开辟了连通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两条通道。一条是陆路上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上的“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每当回顾中阿交往史时，人们便自然地想到为中阿友谊做出贡献的先驱者。早在公元前 139 年和公元前 119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 97 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时，曾派其副使甘英等到过海湾地区。公元 2 世纪，一些阿拉伯商人辗转到达中国。公元 7 世纪，中国正值大唐盛世，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中阿交往不断增加。在此后的岁月里，这种交往经久不衰。

在近代和现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都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在为争取独立、解放和发展民族经济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前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就像中国的黄河、长江和阿拉伯世界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一样源远流长，奔腾不息。进入 21 世纪，中阿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为双方扩大交流与加强合作搭起了新平台，建立了新机制。胡锦涛主席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是相互支持的好兄弟，在经济上是互利合作的好伙伴，在国际事务中是协调配合的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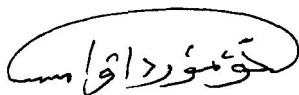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促进中阿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做了大量工作。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成立以后，着力加强了这方





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弘扬中阿友谊,中阿友协策划了《丝路盛开友谊花》这本书。该书所载内容时间跨度长,展现了两千多年来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状况;涉及面广,囊括了政治、外交、经济、贸易、能源、劳务、投资、工程承包、新闻、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宗教、艺术、青年、妇女、旅游等领域。这本书堪称为中阿民间友好交往的画卷。

《丝路盛开友谊花》一书突出了中阿友谊这一主题,具有鲜明的特色。第一,文章的作者长期从事中阿友好工作,所写内容以亲历、见证为主,从而体现了内容的真实性 and 可信性。第二,很多文章涉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并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实和自己的亲身感受,令人读起来生动感人,从而增加了该书的趣味性。第三,文章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中阿友好交往史,涉及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地理、人物、文化、资源,风土人情及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等内容,从而丰富了该书的知识性。第四,书中配有数十张与文章内容密切相关的照片和图片;文句优美,文章如行云流水,从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鉴此,相信《丝路盛开友谊花》这本书的问世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铁木尔·达瓦买提

2007年10月于北京

(铁木尔·达瓦买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会长)

目 录

历史渊源的中国阿拉伯关系	时延春 / 1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阿关系	时延春 / 15
中阿民间外交大有可为	王运泽 / 30
丝绸之路绽放中阿穆斯林友谊之花	
——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穆斯林的对外友好交往	
.....	洪长有 张广林 / 38
电波串起友谊的花环	
——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广播五十年	张 立 / 46
《今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	王 复 / 61
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	陈嘉厚 / 69
知识的殿堂 友谊的窗口	薛庆国 / 83
石油之花结友情	张维秋 / 94
友谊之树 根深叶茂	王新连 / 107
阿拉伯文学在中国	仲跻昆 / 122
“我们相信世界人民的良心……”	彭 龄 章 谊 / 133
继往开来 更加绚丽	
——回忆中国和叙利亚文化交流历史的片段	王贵发 / 142
伊斯兰圣地朝觐面面观	马晓霖 / 152
心灵的沟通	
——我和利比亚朋友的友好交往	李荣建 / 182
亲历中埃友谊的点点滴滴	黄培昭 / 189
中突友谊源远流长	拱振喜 / 206
我的伊拉克同行贾迈勒	顾正龙 /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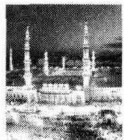
北非花园开满友谊花	石岳文 / 225
阿曼散记	黄培昭 苏丽雅 / 239
阿拉伯婚礼见闻	奚惠芳 / 254
与阿拉伯妇女界友人的交注	刘光敏 / 268
圆梦新丝路	
——在义乌的阿拉伯人	王 复 / 278
难忘的生死考验岁月	
——参与也门萨那保卫战纪实	时延春 / 288
科威特友人的中国情结	石岳文 / 306
驾车穿越阿拉伯世界	
——威志和谐之旅、中阿友好万里行纪实	赵湘杰 / 320
毕尔·艾布·哈特尔	
——第一位捐助希望工程的阿拉伯人	王 复 / 333
白衣天使的风采	孙梅芳 周 玲 宋 元 / 340
盛开在友谊路上的杂技之花	
——中国苏丹杂技艺术交流纪实	林义泉 / 348
新疆文化节在海湾三国	艾尼江·克依木 / 358
帆在吉布提的援外工作	夏环珍 / 364

历史渊源的中国阿拉伯关系

时延春

西亚北非有一片广袤的地域,这就是中东地区。该地区东起东经60度,西至西经18度,南起南纬4度,北至北纬38度。中东地区的居民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为主,因此,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构成中东地区的主体,并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

阿拉伯世界幅员广大,国家众多。它的总面积约1400多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近10%。它原有21个国家和地区,即亚洲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非洲的埃及、利比亚、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1993年9月,印度洋西部岛国科摩罗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总数增加为22个。此外,中东地区还包括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



“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

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之间的友好交往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昔日,那些令人敬佩的开拓者们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陆路和海上两条通道把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地区联系起来,互相交流。

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派使臣到达黎轩，即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据记载，有埃及艳后之称的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年）非常喜欢中国丝绸，传说她曾穿过用中国丝绸做的衣服。另据记载，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奉命再度出使西域，他的副使甘英到达条支，即现在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带。

陆上的“丝绸之路”从中国汉代都城长安出发，西去经天山南北，由喀什穿越现在的阿富汗，抵达安息，即现在的土库曼斯坦和伊朗一带，然后到达条支，即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再延至埃及等地。中国人通过这条交流之路带往西域的多为丝绸，因此被称为“丝绸之路”。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带去其他纺织品、瓷器、漆器等特产，并把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特产带到中国，从而促进了中阿之间的交流。

早期的“丝绸之路”大致走向是东起长安，即现在的西安，出陇西高原，经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安西至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或玉门关便分为南北两路。据《汉书》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自鄯善（新疆罗布泊南及西南若羌、和田一带）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散赛一带）。”也就是说，南路从敦煌沿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北麓到喀什；北路从敦煌穿过沙漠沿天山南麓到喀什。

“丝绸之路”由喀什继续向西延伸，经大宛到安息（今伊朗一带），再到两河流域的泰西封（今伊拉克城市麦达因），并从泰西封延至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继而延至埃及。

公元3世纪中叶，鱼豢在他的著作《魏略》中提到了从安息到埃及亚历山大的水陆两条路线。书中介绍说，从安息西界的安谷南行，由红海北上，在乌丹（乌姆克达夫湾的贝伦尼塞）登陆，然后沿尼罗河而下直达亚历山大，即为水路。从安谷由陆路北行，先到达地中海东部的安提阿克（今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基亚），再经水路抵达亚历山大，这段水路当时需要6天时间。当时的亚历山大是中国与古罗马通商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在埃及史书中，最早记载中国的是《地理志》一书。该书的作者是在亚历山大从事研究工作的希腊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成书约于公

元150年。他在书中称中国为秦尼国。

“丝绸之路”自开辟以来,两千多年经久不衰。陆上的丝绸之路一直在继续,并在不断延伸、扩大。随着航海业的发展,中阿双方的商船很早就开始了驶往对方的航行。据考证,中国与古罗马之间的海上航线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已相接,当时的相接点在斯里兰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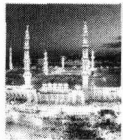
公元5世纪,中国的航海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中国的远洋帆船穿过印度洋,驶抵海湾头。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马斯乌迪在其著作《黄金草原与宝石矿》中写到有关这方面情况。公元5世纪前半叶(相当于中国南北朝宋代时期),时常有中国商船远航至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下,与云集此地的各国商人进行贸易。公元6世纪,中国商船开往海湾更加频繁,从中国南部港口直航阿曼、西拉甫、巴林、奥波拉、巴士拉等地。与此同时,阿拉伯商船也从海湾出发,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抵达中国广州等港口。由于阿拉伯商船带往中国的商品以阿拉伯各种香料为主,因此,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便被称为“香料之路”,也有人称其为“海上丝绸之路”。

中阿海上航线的大致走向是:从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宁波等对外贸易港口起航,驶入南海,沿越南东海岸继续南行,经占婆岛、芽庄、藩郎到昆仑岛。商船穿越马六甲海峡,经过科巴群岛至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沿西北方向航行,至印度半岛西南岸奎隆,由此沿半岛西岸北上,至印度河口提勃儿。商船继续西行,穿过印度洋,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到阿拉伯河上的俄波拉后,沿幼发拉底河北上,便可到巴士拉,如继续西北行,便可到巴格达。由阿拉伯河南航可至阿曼的苏哈尔。由苏哈尔沿阿拉伯半岛东海岸南航,可抵达也门南部港口亚丁。从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直航也可抵达亚丁。由亚丁北上,经红海可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不论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香料之路”,都为开拓中阿关系、促进中阿友好交流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唐朝时期的中阿关系

公元618年建立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随着唐朝内政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对外关系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





阿拉伯地区,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创建了伊斯兰教,他的继承人建立了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威震四海的阿拉伯帝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强国,具备了全面发展相互关系的客观条件,双方又都具有发展关系的愿望,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时期的中阿交往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官方、宗教、民间等方方面面。

唐王朝建立后,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国势强盛,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声誉远及海外,颇受外界重视。唐太宗重视对外交往,重视发展与西域的交通,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他珍视中国同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据说波斯国王曾要求唐朝派兵援助波斯抵抗阿拉伯人,被唐太宗拒绝。那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在麦地那站稳脚跟后,即遣使到中国。中文史料有唐太宗贞观初年阿拉伯派使者到唐朝通好的记载。公元651年,伊斯兰教创立后的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再次派遣使者到中国,时逢唐高宗永徽二年。

公元661年,穆阿维叶建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统治稳定后,对外大举扩张,其疆域东到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形成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因倭马亚王朝旗色尚白,故中国史书称其为“白衣大食”。公元750年,阿巴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先定都库法,后于公元762年迁都到巴格达。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因该王朝崇尚黑色,故中国史书称其为“黑衣大食”。在此期间,阿拉伯来华使节不断。据史料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公元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使中国达39次之多。这些使节把阿拉伯地区的特产如龙涎香等香料及阿拉伯名马赠送给中国政府。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对国外来唐使节的接待工作,对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使节以礼相待,馈赠优厚。公元741年,唐朝政府隆重接待来自白衣大食的使节,授予他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公元753年,黑衣大食派使节到中国,唐朝政府授予其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带。

唐朝时期,中国的航海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唐朝政府于714年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海外贸易的专职机构——市舶司,即管理商船机构,并明令保护外商和鼓励外商来华贸易。阿拉伯人也非常

重视与中国的海上交通。公元762年,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将其都城由大马士革迁往巴格达,明确表达了发展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意愿。他说,巴格达是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些遥远的国家,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

中阿官方频繁的交往有力地推动中阿民间各种经贸活动的发展,由陆路和海路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不断增加。8世纪中叶,一位名叫阿布·奥巴德的阿曼商人驾驶一艘木帆船到达中国。阿曼人认为,这个阿布·奥巴德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航海家辛伯达。据记载,辛伯达曾7次航海旅行,最后一次抵达中国。

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地到达中国,他们主要聚居在长安、洛阳等内陆城市以及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沿江城市。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曾到过中国的阿拉伯航海家苏莱曼在其所著的《苏莱曼东游记》中记述,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从事贸易活动的其他外国人一度多达10余万人。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有象牙、犀牛角、乳香、龙涎、宝石、珊瑚、明珠、琉璃、丁香、没药等。他们从中国采购的主要有蚕丝、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铁器皿等。他们称赞中国物产丰富、买卖公道,中国政府关心阿拉伯等地商人生活并维护他们的利益。有的阿拉伯商人把中国的茶叶称为“干草叶”,并在见闻录中说:“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干草叶为‘茶’。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在唐代中阿友好交往中,有不少趣闻轶事,伊本·瓦哈比在中国的经历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位阿拉伯人是古莱氏族人,乘船到达中国广州。他非常想见中国皇帝,此时的中国皇帝是唐懿宗。公元870年,伊本·瓦哈比由广州来到长安。他屡次上书,称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族人,要求谒见皇帝。皇帝知悉后,命妥善安顿,并命有关官员查证是否属实。当皇帝确信此人所言属实后,接见了。皇帝称赞穆罕默德和他的人民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并询问了有关哈里发和伊斯兰方面的情况及伊本·瓦哈比到中国的因由等问题。伊本·瓦哈比一一作答。他说,他对中国皇帝的威严及中国的美好、富足早有所闻,所以决意前来亲眼看看。他说,他的王是自己的叔伯兄弟,他要把自己





的所见所闻向他的王禀报。唐懿宗听后大喜,传谕给伊本·瓦哈比一份丰厚赏赐,并命驿馆派马将此人送往广州,还命广州总督殷勤厚待,直至护送出境。伊本·瓦哈比回国后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广加宣传,在中阿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在唐朝与大食国交往中,也发生过军事冲突。据史料记载,唐朝时西域有一小国,国王姓石,故名石国,该国曾一度属唐管辖,其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一带。公元750年,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指责石国王因“蕃礼有亏”、“无蕃臣礼”而奏请讨伐。石国王请降,但高仙芝伪与约和,乘石国不备袭之,虏其国王,杀其老弱,掠走财宝,石国人为此伤心痛哭。石国王之子逃往阿拉伯地区,向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求救,获准。高仙芝闻讯后,于公元751年亲率3万大军进攻大食,深入700余里。双方在怛罗斯城(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城)展开激战。因唐军孤军深入,高仙芝轻敌指挥失误,再加上唐军中突厥人葛逻禄部临阵反叛,致使唐军大败,2万余人成为阿拉伯军队俘虏。

怛罗斯之役是中阿关系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唐军失败导致唐朝势力在中亚的衰落和大食势力在该地区进一步增长。但这次冲突并没有使中阿关系继续恶化。公元752年,也就是战后第二年,黑衣大食就三次遣使中国。公元755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请求黑衣大食派兵帮助平乱。公元757年,黑衣大食与拔汗那、安西一道派兵进入中国,助唐平定了安禄山之乱,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

怛罗斯之役唐军虽败,但却对中阿的文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批被俘唐军官兵被押往阿拉伯地区,他们中不乏精通技术的能工巧匠。这些人把中国的造纸、绘画、陶瓷制作技术、金银器加工、工具和武器制作工艺传授给阿拉伯人。在这些被俘的唐朝军人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知识分子,是文人出身。他在大食国居留长达11年之久,其间周游了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埃及、苏丹、摩洛哥等地,于公元762年搭乘商船返回广州。他把在阿拉伯地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经行记》一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唐朝时期,中阿在文化、科技、医学、手工艺等方面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据记载,公元7世纪,中国的养蚕技术传到阿拉伯地区。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阿拉伯地区,然后传入欧洲。公元

8—9 世纪,中国的瓷器及其制作技术传入阿拉伯地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也把他们的医学著作、药品、玻璃制造、缝合木船技术等传入中国。

唐朝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中国及至东方所产生影响最显著的体现。恩格斯说:“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民的,特别是适合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官方。早在穆罕默德创建时,他就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还派使者到中国。他之后的哈里发和大食国频繁遣使中国,详细介绍伊斯兰教的情况。第二,民间。从公元 8 世纪中期起,大批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纷纷到中国经商定居,同当地人通婚,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第三,军人。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唐皇向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请求派兵平乱。阿巴斯王朝应允,并速从中亚驻军调拨四千名黑衣大食骑兵飞驰急援,帮助唐皇平息了这场武装叛乱。这支援唐的黑衣大食骑兵受到了唐朝的善待。平乱之后,大批将士在中国西北地区落籍定居,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后代,把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带入中国。

唐朝政府非常尊重在华的阿拉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对他们善加管理。公元 851 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游历广州的见闻中写道:“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麇集者,曰康州(即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任命回教制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与此同时,在阿拉伯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出现了专门生产穆斯林生活用品的作坊,方便他们的生活。



宋元时期的中阿关系

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及其他原因,中阿交往几乎陷于停顿状



态。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中阿往来得以恢复并趋频繁。由于宋朝无力平定北方的辽、金政权和西北的西夏政权,宋朝与阿拉伯地区联系的陆路交通不畅,中阿交往主要取道海路进行。

公元966年即宋太祖乾德四年,僧行勤游西域,带去宋朝政府致阿巴斯国王的信函。公元968年即开宝元年,大食便遣使中国。此后,阿拉伯遣使中国数十次,其中有哈里发派遣的政府使节,更多的是商人“舶主”和“番客”。宋朝政府对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使节一律友好相待。公元971年开宝四年,大食来华贡使被封为“怀化将军”,并“以金花五色绫纸,军官诰以赐”。公元1072年即宋神宗熙宁五年,阿曼贡使到开封朝见宋神宗。宋神宗因其对开展中国和阿曼的“互市”贸易贡献巨大,特授予他“归德将军”封号,并赏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那时,宋朝政府规定,贡使可以得到沿途地方官的优待,如妓乐迎送、宴请、乘轿、骑马、以客礼见知州、道制、监司等。

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发展海外贸易,此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大批阿拉伯商人到中国经商。在宋代海商看来,当时世界上中国海上通商者首推阿拉伯地区。宋人文献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名宝货者,莫如大食国。”为此,宋朝政府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并在礼部机构中设立了主客司,“以宾礼待四夷之朝贡”。宋朝政府还在外商聚居的地方设立了专门的“蕃坊”或“蕃巷”,以加强管理,也为这些客商提供方便。

宋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居诸外商之首,而在这些阿拉伯商人中,尤以阿曼苏哈尔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最大。当时,苏哈尔港是扼守海湾、东非、西亚通往印度洋的门户,直至15世纪,苏哈尔港一直享有“中国的门户”之称。因此,苏哈尔商人凭借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对华贸易中独领风骚。蕃坊有蕃长,由他们自己简选,由宋朝政府任命。蕃坊设有办事机构,叫番长司。此外,在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也居住着大批的阿拉伯商人,每地都设有蕃坊。

宋朝政府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来华的阿拉伯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许多人在中国成家立业,繁衍生息,定居不归。在蕃坊中建有“蕃学”,并建有集中的“蕃客墓”。阿拉伯商人们在广州还修建了清真寺。在宋代,他们在泉州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一座称为艾苏哈卜清真寺,始建于公元1009年,另一座建于公元1131年,称

为泉州清净寺。此外,有的蕃坊子弟被宋朝政府册封为官。据朱彧记载:“元祐间(1086—1094年),广州蕃坊人刘姓娶宗女(即赵宋皇族之女),官至左班殿直。”“左班殿直”为武官之品阶,相当于正九品官。宋末的阿拉伯巨商蒲寿庚、蒲寿晟兄弟均被封为朝廷高官,掌握闽粤的市舶司大权,成为福建的首富豪门,在皇帝眼中为特殊人物。

宋朝时期,中国北方的辽国与西域的大食国在陆路上保持着友好交往。据记载,公元924年即辽太祖天赞三年,大食遣使到辽国朝贡。公元1020年即辽圣宗开泰九年,阿拉伯国王遣使辽国,送大象及特产,并为王子割册求婚。公元1021年,阿拉伯国王再次遣使到辽国求婚,辽圣宗遂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的女儿可老为公主,远嫁到阿拉伯。这桩婚事在中阿交往史上留下了佳话。

公元13世纪初,蒙古族从北方草原地区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大汗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于1279年灭南宋。在此期间,蒙古国向邻境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并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第一次西征发生于1218—1223年,主要目标是进攻中亚的花刺子模(今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带)。第二次西征发生于1235—1242年,主要目标是进攻与花刺子模为邻的钦察部落及鞑靼诸公国。第三次西征发生于1252—1260年间,主要目标是征讨尚未臣服的西域诸国。此次西征的统帅是旭烈兀。他挥军向西挺进,于1256年灭伊朗的伊斯兰伊斯玛仪教派的木刺夷国。1257年春,蒙古军进驻伊拉克北部,准备向阿巴斯王朝发动进攻。此时的阿巴斯王朝已经衰落,其实际控制区只限于报达(今巴格达)周围地区。1258年春,蒙古军攻陷报达,杀死哈里发,阿巴斯王朝宣告灭亡。1259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叙利亚,攻占大马士革。1260年春,旭烈兀获悉蒙哥汗归天,遂率主力东移,只派部分兵力继续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地区。1260年9月,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军队在大马士革以南的艾因扎鲁特大败蒙古军,西征至此结束。

蒙古人通过三次西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中亚和两河流域纳入其控制之下。此时,中阿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均畅通无阻,中阿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盛极一时。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往中国,主要安置在甘肃、宁夏、青海、云南、陕西、新疆等地。这些移民统称“色目人”,受到厚待。他们的政





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比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和原来南宋统治下的南人政治地位都高。这些阿拉伯移民与当地汉人、蒙古人通婚,繁衍人口,故有“元朝回回遍天下”之说。阿拉伯移民中在元朝做高官的也不乏其人,担任平章政事等重要官位的达30多人。据元史记载,有位名叫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的移民,出身阿拉伯武士,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随蒙古西征军到中国后,做过陕西、四川、云南的平章政事,位次于丞相,他的五个儿子均居显位,其长子做过云南平章政事,他的子孙繁衍为纳、丁、速(苏)、刺四姓。

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流是多领域和全方位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的天文学、算术、印刷、火器、医学、制图学等传入阿拉伯地区。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建筑学等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中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并留下一些颇具史料价值的文献。公元12世纪,南宋的周去非著有《岭外代答》。13世纪上半叶,赵汝适著有《诸蕃志》。他们都对阿拉伯地区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阿拉伯作者伊德里斯在其著作《云游者的娱乐》中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随着中阿关系的发展,双方的旅游交往也不断增加。公元1301年即大德五年,元朝的海运官杨枢率官木船出海,到达海湾。公元1304年,他再次出海,从海湾地区采购白马、琥珀等珍贵物品满载而归。公元1330—1339年,元代著名大旅行家汪大渊两次出海,遍游伊拉克、麦加、海湾、亚丁湾、埃及、摩洛哥等地,并写下《岛夷志略》,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伊本·白图泰是著名的阿拉伯大旅行家。他于公元1304年生于摩洛哥丹吉尔,从1325年起,他开始周游一些亚非国家和地区。1347年,他到中国,游览了泉州、杭州、广州等地,受到了元朝各级官吏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生动而详细地记述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本人是中阿友好交往的使者,他的游记也成为记述中阿友好关系的珍贵资料。1377年,伊本·白图泰与世长辞,葬于他的出生地丹吉尔。

随着蒙古军的三次西征及此一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伊斯兰”一词在中国历史上首见于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南宋人开始将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人译为“回回”。随着回回人数的增多,清真寺遍于各地。在元代,伊斯兰教是仅次于佛教和道教的第三大宗教。由于回回人的来源不同,元代穆斯林中逐